

方振武：

领导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名将

□ 黄宗慈

赤子胸怀 喋血沙场

方振武(1885—1941),出生于安徽省寿州(今寿县)瓦埠镇一个有爱国传统的家庭。辛亥革命前,他读了许多革命书刊,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奋勇参加了1908年熊成基在安庆领导的马炮营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清军残酷地镇压下去,方振武也被捕下狱,但却震撼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反动统治。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方振武在光复南京的激战中,同清军浴血奋战;1913年讨袁战役中,他在徐州率一营兵力同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数个昼夜。讨袁失败后,他东渡日本,入尚武学校学习军事,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在广东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海军陆战队任司令。

1927年以后方振武所部接受武汉政府改编,先后任第九方面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等职。这时他逐步认清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独裁专制的面目,积极联络各派势力进行反蒋活动。1929年5月,方振武出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他正想革除积弊,把家乡建设好,但他的反蒋活动被侦知,因而任职4个月就被蒋蒋至南京加以软禁,后又投入汤山陆军监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方始获释。

毁家纾难 起兵晋南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日趋深入,民族危机愈益加重。方振武获释以后,到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日。1933年初,日军侵入热河,强占长城各口,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危在旦夕。他写信给他的旧部毅然表示: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本人“决心毁家纾难,抗日救国”。他卖了自己的房屋和财产,集资10万元,充作军费,剃去蓄须,换上便装,偕同心腹部属,秘密来到山西介休。

3月1日,抗日军民在介休城南举行了誓师大会。方振武将军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会议宣布成立抗日救国军,方将军出任总指挥。誓师大会之后,方振武即率队北上抗日。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后,千方百计加以阻拦。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绥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明确表示:“非抗日不能固存,非铁血不能收复失地。”“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鏖战塞外 重创敌寇

方振武率领抗日救国军于1933年5月底来到张家口,冯玉祥亲自率领一批军政要员,如杨麟阁、吉鸿昌、宣侠父、张允荣等步出郊外迎接。当时,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除抗日救国军外,还有东北、热河等地将领邓文、李忠义、刘震东等,及由热河退入察省的部队,察省

地方武装等,同盟军迅速发展到了8万多人。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了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选举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宣侠父等11人为常委。6月20日,吉鸿昌任北路前敌总指挥,6月22日,方振武任北路前敌总司令。

这时日本侵略者正在加紧进攻察北地区,日机轰炸了独石口,日军先后攻陷宝昌、康保,妄图经张北进逼张家口。6月20日,方振武、吉鸿昌等率领部挥戈北进。在武器简陋,给养不足的情况下,同盟军于22日收复康保,7月1日再克宝昌、沽源,连下三城,声威大振。7月7日至12日,方振武、吉鸿昌将军指挥的同盟军先头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经过浴血奋战,收复了察北重镇多伦,将日伪军全部逐出察省境外,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上海、北平、天津和许多省份的团体、个人函电交驰,交口称誉,争相捐赠财物,表示愿为同盟军的坚强后盾。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极力阻挠和破坏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在日蒋夹击下,同盟军处境维艰。在此形势下,冯玉祥于8月5日被迫下野,离开张垣,息影泰山。

义旗不倒 坚持苦斗

冯玉祥被迫离开张垣后,方振武、吉鸿昌和一些爱国将领坚决不撤盟、不倒旗,表示要誓死抗战到底。他们接受中共察哈尔前委的建议,把方、吉所部和愿意继续抗日的队伍转移到张北,8月16日方振武通电代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

方、吉所部转移张北不久,就东进至独石口,奔向抗日第一线。方振武任总司令,分兵三路,南指北平,同时计划夺取北平作为抗日根据地。八月底,他们收复了丰宁。9月初出马兰峪口,向南疾进,奇袭北平。行军三四天在昌平县工布厂、东山口击溃抵抗之敌以后,继续星夜南进,在沙河镇遭到国军重兵拦截,抗日讨贼军遂向东转进,占领了北平以北的大小汤山。稍事休整后,继续南进至潮河东岸牛栏山一带,国军也大批开抵潮河西岸布防,双方隔河对峙。这时,抗日讨贼军已逐渐陷于四面被围的状态:东、西、南三面是国军,北面是日军。日军飞机不断地对他们狂轰滥炸,国军也不停地攻击,抗日军伤亡很大。

最后,抗日军队弹尽粮绝,部队逐渐被逼进山谷。方、吉将军决定接受北平八大团体倡议,同国军进行和平谈判。当时国军应允保证方、吉生命安全,军队由国军改编。但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当抗日讨贼军放下武器,方、吉到达牛栏山国军驻地后,即被扣留,并用汽车把他们押送北平,准备加以杀害。

虎口脱险 抗日到底

当押解“要犯”的车队从牛栏山国军驻地驰赴北平途中时,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的暗中帮助,方、吉将军乘天色昏暗之机从汽车上下来,钻进荞麦地逃脱,押解士兵亦伴作不知。方振武逃离虎口之后,急急南行,晚上8时许,到了通州东北一个村庄,见有一家还有灯火,敲门进去,开门的是一位老人,方向他如实地说明自己是抗日同盟军的方振武,因为抗战犯了“罪”,蒋介石要抓他,希望老人能救他一救,并帮助他到达天津。老人听后满口答应,忙叫家人生火做饭。第二天清晨,老人装了一车菜,叫方化装成农民的模样,一起坐车,循小路绕通州,一直把方送到天津。这位老人拼着身家性命来搭救方将军,反映了抗日同盟军深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方振武到天津后在徐谦的住处呆了三天,然后由徐买票让方乘意大利皇后号轮船出走香港,接着流亡英国伦敦、意大利威尼斯等地。

方振武流亡海外期间,继续进行抗日救亡的活动。这一期间,他还利用在国外接触甚广的机会,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进行认真考察,并联系我国的情况,撰写多种著述,探求救国救民之道(现在已发现的书目有《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与建设》《余之中国观》《战后中国》《职业民主政治之方案》《振武言论集》等)。其中有些观点非常明确,如他认为:“我国今除内有封建残余势力与买办阶级的剥削,外有资本帝国主义的榨取,国民经济在此双重压迫之下,乃不能不沦为次殖民地”,“而中国脱离了次殖民地的枷锁以后,必能逐步走向繁荣的境地”。他还认为“中国本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对于经济基础的农业,自当不容忽视”,“要‘以此基点做出发,进而推进工业,使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把工业建设,依经济的分化,布散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这样建设的工作,乃可以有美满的成果’”。这些主张早在30年代就能鲜明提出,证明了方振武的远见卓识。

“七·七”事变后,方振武回到祖国,冀图重返抗日战场,但英雄竟无用武之地,而当当局所不容。他目睹烽烟遍地,神州大地被寇寇蹂躏践踏,内心充满了焦虑和痛苦。在参加抗日无望的情况下,他怀着悲痛的心情离开大陆,再次出走香港,继续不遗余力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前夕,他还在九龙塘俱乐部邀请留港的海外侨胞和本港名流集会放映孙中山任大元帅和策动北伐内容的电影,方振武作了振奋民族精神的讲演。9日,日军侵占香港,方准备重返大陆,奔赴抗日战场,但刚刚进入广东省中山境内,就被敌暗杀。这位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民族英杰抱恨辞世。



中共军队的第一批女兵

□ 周文洋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枪声骤响,拉开了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大幕。参战部队中,有何柏华、陈兆森、王鸣皋、杨庆兰、孙格非等31位勇猛无畏、机智果敢的巾帼英杰和将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尽显中华女性的顽强斗志和革命精神,她们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军队第一批女兵。

这些女兵大多曾是宋庆龄、何香凝创办、主持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和武汉妇女政治训练班的学员。当时,两班(队)以提高政治觉悟、培养领导能力,发动广大妇女参加革命,翻身解放为目标,200余名学员中,后来走出赵一曼、胡筠、谭勤先等巾帼英雄和一批妇女革命骨干。

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镇压共产党人,武汉三镇一时间血雨腥风,白色恐怖肆虐。为保存革命实力,妇女政治训练班结业、军政学校(女生队)解散,部分中共党员学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被秘密派入叶挺、贺龙率领的第11军、第20军和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军医处等。这些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取得胜利后,按中共中央命令陆续南下。队伍抵达瑞金后,总指挥部将分散在各部的30多名女兵集中,成立战场救护队。

1927年8月28日,国民党部队2万余人从瑞金、会昌一带夹击起义军,中共中央做出决策:集中1万多兵力,从会昌西北的洛口突围,救护队的女兵冒着密集的枪弹炮火,从阵地上肩抬身背,把一个个伤员送到救护站。战斗持续两天一夜终于打开突破口,部队开始转移,女兵们还在战场寻找负伤的战士,救护队员杨庆兰

在一条水沟边发现一个伤员,已气息奄奄。杨庆兰拼尽全力将他背到救护站,得到及时救治,这位伤员就是后来的开国大将陈赓将军。

起义军突出重围继续南下,女兵们不但救护伤员,还担负文艺宣传、发动群众的任务。部队每在村镇休息,女兵们都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发表演讲,让老百姓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任务。在潮州地区,女兵们组织当地妇女为部队碾米、做饭、送水。战斗激烈的时候,女兵们带领数百名妇女送军粮、运弹药、抬担架,为夺取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后来,依照党组织安排,在潮州红十字会医院工作的胡毓秀、谭勤先等女兵转移到上海;周开壁、曹泽芝等女兵随部队进入海陆丰地区,参加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彭援华、肖凤仪等女兵跟随起义军转战闽粤赣边界,后被派往武汉做地下工作,踏上新的革命征途。

据党史资料记载:参加南昌起义的31位女兵,如今知道姓名的27人,只知姓氏不知名字的4人。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军中女兵,走下硝烟弥漫的战场,恪守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不懈地为理想信念奋斗,为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贡献出了毕生精力。如:彭援华,抗战时期任中共岳阳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等职;王鸣皋,随军转战闽、粤、赣等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任贵州省文教局副局长等职;胡毓秀,跟随部队南下,先后在军部参谋团、中华苏维埃委员会工作,全国解放后,任上海市妇联宣教部副部长等职。

古代中国的贷款制度

□ 潘颖珍

贷款最先开始于民间,通常叫高利贷,因利息高,俗称“驴打滚”。曹雪芹笔下的管家婆王熙凤推迟发放主子 and 奴仆的月钱,靠放高利贷的利息攒私房钱,维持奢华的生活。

高利贷的出现与土地私有制度相关。公元前4世纪中期,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为土地兼并提供了法律依据。每逢秋收时节,农民为缴纳赋税,只好向地主或富农借贷;每当青黄不接之际,农民为了活命,只好咬牙向富户借贷。到时还不上本息的,只好变卖土地,甚至以妻子儿女作抵押。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朝廷颁布青苗法,规定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贷款或谷物给农民,收获后还本付息。此法令旨在抑制兼并之家的高利贷盘剥,缓解自耕农的燃眉之急。

青苗法系政府放款或借贷行为。著名学者柏杨认为古代中国的贷款制度源于王莽改制。公元8年,王莽篡汉,改国号为“新”,为营造中国社会新气象,抑制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实行赊贷,即由政府办理贷款。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的,可向钱府借贷款,政府借钱不取利息;祭祀贷款十天归还,丧事限三个月归还不收利息(今之无息贷款);工商贷款每年要交十分之一的利息。

唐代出现了为商业服务的柜坊和飞钱。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沿岸出现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飞钱又称便换,类似今天的汇票。有了飞钱,商旅就不用长途携带钱币,各地之间也不用运输税钱。宋真宗时,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问世;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将交子发行权收归政府。元明之际,交子发展为可以兑换银子的银票。明清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和缓慢发展的时期。清乾隆年间,晋商开始兴办票号。票号又称钱庄,是对柜坊制度的发展。票号经营存款、放贷、汇兑,也可以为官府代解钱粮。票号的出现标志着私人商业资本的形成,也便利了工商业者贷款扩大再生产。



宋代钧窑葵花式花盆

□ 缪士毅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民窑发展,朝廷也在南北各地设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其中钧窑与汝、官、哥、定窑等并称宋代“五大名窑”瓷器。釉色绚烂的钧窑瓷器,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宋代瓷器高水平的烧造技艺,难怪历来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

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见图),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出自宋代钧窑,外观呈六瓣葵花式,折沿,口沿边起棱,深腹,圈足,堪称造型优美独特。内外施釉,色泽莹亮,盆内釉呈天蓝色,外壁釉呈玫瑰色,可谓天蓝色幽雅,玫瑰色艳丽。色调之美,妙不可言。

外底涂抹酱黄色釉,有5个圆形渗水孔,隙地刻有标明器物大小的数目字“七”,并有清代乾隆时内务府造办处玉作匠师所铸楷体“建福宫”横排、“竹石假山用”竖列款识。

花盆,在我国加工制作历史悠久,它



与花卉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作品,造型上富有艺术性,其分类,按质地有陶质、釉质、瓷质、石质等之分。按式样有圆形、椭圆形、半圆、扇形等之分;按规格又有深浅与口径大小上的区别。而宋代钧窑花盆类,素为花盆中的佼佼者。

宋代钧窑多以器皿类造型出现,其

中以养花用的花盆类居多。钧窑花盆类瓷器有其自身特点,其釉色有天蓝、玫瑰紫、丁香紫等陈设,外底或足内墙多刻划从“一”到“十”的汉字中的一个,数目字越大,器物的尺寸越小。同时,通过数目字标注,可便捷选择同样型号的花盆与花盆托,从而使花盆与花盆托配对使用更为方便。

钧窑花盆类器物的出现,与宋徽宗有密切相关。据故宫出版社出版的《故宫陶瓷图典》中介绍,北宋晚期,宋徽宗为了装点位于开封城东北隅的皇家园林“寿山艮岳”,曾在江南设“应奉局”大肆搜刮奇石异草,怪石树木,通过“花石纲”运往开封。为此,需要大量用来制作盆景的花盆。而当时河南禹县窑所创烧的天蓝釉、铜红窑变釉瓷器,光洁陆离,绚丽异常,最适合用于制作花盆,因此被宋徽宗相中,于是就在当时的河南禹县设窑,专门为皇家烧造花盆、花盆托等陈设用瓷。